

目 录

姚重华同志生平

-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 (1)
- 回忆与希望.....姚重华遗稿 姚礼乾整理 (5)
- 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悼念姚重华同志.....安毅夫 (15)
- 严厉的爱——追忆姚国安同志.....梁 燕 (23)
- 解放前夕清华中学革命活动见闻.....周克勋 (30)
- 解放前夕贵阳中学的学生运动.....朱文运 (35)
- 四十年代贵州大学革命斗争片断.....蓝华富遗稿 (48)
- 前贵州大学学生运动概述.....朱文达 (53)
- 一九四九年贵阳八校师生的反饥饿斗争.....区作霖 (63)

* * *

- 红一方面军长征过花溪.....花溪区文化馆 (71)
- 回忆解放贵阳的几件事.....冯祖华 (76)
- 山城风暴——贵阳一九三八年“二一九”事件点滴
.....李 石 (80)
- 党指引少数民族开展斗争.....唐植民 (90)
- “筑光音乐会”女中队在花溪.....陈胤孙 (96)

国民党贵阳鸭子塘特种监狱纪实……………陈梧山（102）

• • •

怀念贵州地下党的优秀领导人黄大陆同志

……………李石（116）

记我的胞妹蓝运臧、蓝运铨……………蓝芸夫（129）

回忆述彭哥哥和运臧嫂嫂……………寇述蕙（141）

缅怀王定一烈士……………熊唯真（152）

和启霖、家祥在一起的日子里……………邵公文 黄慧珠（161）

悼恭彦同志……………奇慧（174）

缅怀顾希均烈士……………黄世琮（179）

蒋士忠同志传略……………张桂江（183）

• • •

简明年谱……………卢焘遗稿（188）

先父卢焘事略……………卢慈仪（196）

回忆坚姐……………何治华（209）

商务印书馆工人代表张守仁……………徐泽庶（214）

封二：一九三五年四月九日红军长征途经高坡书写的标语

封三：“新联”出版的地下刊物《理论与实践》

姚重华同志生平

上海市人民政府
教育卫生办公室

编者按：原中国共产党贵阳特别支部负责人姚重华（姚国安）同志，于今年三月不幸逝世。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革委会曾发出唁电：“姚重华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的心情十分沉痛，谨向姚重华同志表示深切哀悼，并向他的亲属致以亲切慰问。姚重华同志曾担任过贵阳地下党负责人，为创建党的外围组织‘新联’作出了贡献。他在贵阳为党播下了革命火种，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为纪念姚重华同志，我们特转发这篇材料。

姚重华同志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铁路职员的家庭。抗日战争时，全家遭受很大不幸，他自己颠沛流离，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之苦深有体会。在动乱中，他仍坚持刻苦学习。一九四五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同年冬，昆明爆发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学生运动，他以强烈的正义感和满腔热情投入运动，并在地下党的教育影响下开始读马列主义理论著作，重新探讨自己的人生

观，从原来一心只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科学家，认识到不能走个人奋斗的路，应把自己的一生溶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洪流之中。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清华大学入党，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同党的命运完全结合在一起。

入党后，他在清华地下党的领导下，扎扎实实做了不少工作。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共南方局鉴于地下党组织遭到敌人的彻底破坏，决定派他到贵阳做地下工作，担任贵阳特别支部的负责人。这时他才二十一岁，读完物理系三年级，他毅然放弃了最后一年的学习，到贵阳去做党的工作了。当时贵阳是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统治的地方，特务多似牛毛。在这黑暗、险恶、艰难的环境里，他认真贯彻执行南方局的指示，同特别支部的其他同志一起，迅速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并从中慎重地发展了党员，开展党的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他到香港向南方局汇报工作，当时南方局负责人钱瑛同志要他代表贵州去北京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但他要求立即回贵阳工作。一九四九年六月由于被特务发现，他同特别支部的其他两个同志撤离了贵阳。他在那里工作时间不长，但在关键时刻，为党播下了火种。贵阳的地下党员和“新联”的同志在他们离开之后坚持作战，在迎接解放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有些同志英勇牺牲了，留下的同志经过党的培养，现在都已成为贵阳的领导骨干。

解放初，姚重华同志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工作，五二年调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五四年调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设计院任工艺科科长，并评为工程师。五九年调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业周报编辑部工作。六一年至“文化大革命”在

华东局组织部工作。不论在什么岗位，他都满腔热情，钻研业务，刻苦学习，不计名位，扎扎实实地工作。在工作中注意调查研究，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不是随风迎合。

在“文化大革命”中，姚重华同志遭到“四人帮”的严重迫害。一九六八年二月，他和他爱人同时被诬陷入狱，他被关押达三年之久。在狱中姚重华同志受到非人待遇，使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在种种威胁逼供面前，他坚持党性，坚持真理，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一九七一年一月被释放，下放干校劳动。一九七二年七月被安置在上海南汇县农业局继续受到迫害，直至“四人帮”粉碎，他身处逆境，仍胸怀大志，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对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虽两腿由于在狱中受风寒，患寒腿症，酸痛不堪，仍经常下乡做调查研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他对“四人帮”的反动本质有进一步认识，曾写信给一个老同学说，要认真读点书，准备将来“批逆鳞”（批“四人帮”）。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姚重华同志全家政治上得到解放。他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工作，这时他已身患癌症，总是想在自己有限的有生之年，尽最大的努力对党做更多的工作。一九七七年初调上海市农办。一九七九年五月，调复旦大学任党委组织部长。复旦大学的组织工作任务十分繁重艰巨，而且地点离家很远，他身患重病仍知难而上。工作中，坚决认真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切实做调查研究，是非分明，出于公心，敢于负责，敢于直言，踏实苦干忘我的工作精神，为大家所公认，一九八〇年二月提任为党委副书记。一九八一年三月调上海市政府教卫办。不久，病发住入华东医院。

一九七四年夏他嘴唇上患黑色素癌，一九七七年转移到左颈淋巴，一九八一年三月转移到右臂肱骨，以至全身扩散，至一九八二年三月六日逝世。他从患癌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病情，在这长达七年半的患病过程中，他始终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彻底唯物主义态度对待疾病，并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革命事业。癌症几经移转，几次动手术，他都无所畏惧，谈笑风生，每次手术后都只稍加休养，就坚持上班，忘我工作。在最后一年的时间里，疾病给他带来难以忍受的折磨和痛苦，他从不消极悲观，仍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同病魔作斗争。在住院期间，他仍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工作、关心病友和护理人员。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中旬以后，进入病危阶段，这时他向市教卫办领导同志最后一次汇报自己的思想，说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再为党多工作几年，并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希望和意见。至于个人的后事，他向组织和家属再三强调要以唯物主义观点来办理，一定要移风易俗：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瞻仰，不留骨灰，归之于大自然。

姚重华同志是个好党员、好同志、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对党忠心耿耿，数十年如一日，在地下工作时不避艰险，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莫大冤屈，他仍坚信共产主义，心胸开阔，对党毫无怨言。“四人帮”粉碎后，虽患癌症，为党的事业奋不顾身，献出了全部力量。不管在什么情况和境遇中，他都坚持党性，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对工作脚踏实地，苦干实干；对同志胸怀坦白，以诚相见；对学习坚持不懈，刻苦钻研。他的过早去世，是党和人民的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高尚品质、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奋斗。

回 忆 与 希 望

姚重华遗稿 姚礼乾整理

我离开贵阳已经三十二年了。从那时起至今和很多同志没有联系，偶而碰到一些贵阳的同志，谈的也是当前的事情多，过去的事情少。现在要我回忆过去的事情，很多都已淡忘了，但有很多同志还在，他们可以补充，可以修正。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南方局决定派同志南下，去做地下工作，以迎接解放。当时组织上决定要我和梁燕到贵州去，在交代这个任务的时候，组织说明贵阳的党组织已经被破坏过，所以到那里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经过一段时期以后，会有人来联系，在没有人联系之前，我们只能够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也就是说相当于现在的青年团，党员暂时还不要发展，了解一些情况以后再说。

后来梁燕先到了贵阳，他在清华中学找到了一个教员的职务。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也替我在清华中学找到一个教员的职务，但时间已经比较晚了，我到贵阳已经是九月初了。

那时，贵阳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反动统治中心，谷正伦（曾任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当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贵州绥靖公署主任——注），谷正纲（国民党中央委员——注）

这些人都是贵州人。如果照有些人的话说，贵阳是特务如麻！我们，特别是我，人地生疏，究竟怎么开展工作，心里还没有底。梁燕也离开贵阳两年多，他对当地的情况也不够了解。所以，后来我们商量，先了解一下清华中学的情况。我们了解后发现，清华中学虽然教师中有的是国民党员，但是他们对当时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早已失去信心，很多人同情共产党，只有个别人思想比较反动。另外，在学生中间，有不少人追求进步，思想比较活跃，特别在高三年级。所以，我们在十月份的时候，就决定先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以清华中学和贵州大学作为重点，发展一些可靠的、要求进步的和愿意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一些学生和教师。我记得在起草的时候，我们的章程还是比较严格的，并不象过去在北京“民青”那样子，我们这章程的要求同以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要求是相仿的。在介绍情况的时候，梁燕首先就介绍了清华中学高三年级学生朱厚泽，说这个同学在政治上比较敏感，要求进步，在同学中有威信。以后就由我和他联系。至于贵大的一些事情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都是交给梁燕去搞了。

在十月份以后，我们就逐步地物色一些进步的学生，了解他们的情况，和他们进行个别交谈，开始组织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搞读书会，搞一些文娱活动，搞一些其他的个别串连，看来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在清华中学的校庆纪念会上，我们专门排演和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这给大家的震动很大。因为在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区里，高尔基的《海燕》是革命的诗歌，要受到国民党的取缔。

这时期，除了在贵大和清华进行活动以外，我们通过朱

厚泽、梁燕和在贵阳住得比较久的一些同志，了解在贵阳市区里边还有些什么人，有些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去进行活动。但因为学校是在花溪，进城较困难，所以活动的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我记得有一次，不晓得是朱厚泽还是梁燕告诉我，城里有一个女同志叫杜蓉，双脚已经断了，躺在床上，但是这个同志思想很进步，人也很热情，在她的周围团结了一批正在读书的高中学生。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此就想办法和杜蓉联系上了。她非常乐意地接受了我们交给她的任务——就是说向她周围的同志宣传一些进步的思想，主要是讲国民党快要倒了，我们青年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要支持共产党。

这个工作大概进行了不久，已经到了寒假。当时我收到一封组织上的来信，说明没有人再来联系了，要我们自己独立工作；同时要我到香港去一次，和南方局直接联系，另外还有一点其他的任务。所以，我在寒假的时候（那时已经是一九四九年了）先到重庆拿了一些东西又到武汉，由武汉再到香港。在香港住一个木匠家的楼上，等南方局的同志来联系。大概那个时候已是二月中旬了，最后是由南方局的朱语今同志来同我联系。他首先提出叫我不要再回贵阳去了，要我到北京去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但是我不太愿意，我觉得我还应该回贵阳去，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同志初步做了一些工作，也有了一些基础。他说那以后再说吧，先要我回到汉口，把出席全国青代会的事情告诉汉口的党组织。

我第二次回到香港的时候，见到了当时南方局的负责人钱瑛同志。她详细地向我询问了一些贵阳的情况，还是劝我到北京去，我没有同意。最后，她觉得我回贵阳也有好

处，因此就答应了。她详细地同我讲了我们地下党组织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要积蓄力量，迎接解放，而不是象过去在北京时那样搞学生运动，搞斗争，暴露自己。特别是在贵阳，我们几次党的组织都遭到了破坏，原因就是暴露了。她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准备一些干部，在解放以后，使我们党能很快地了解、熟悉、掌握贵阳的情况和动态，以便于工作。

当我回到贵阳的时候，已经是三月初了。

在香港时，朱语今交给我一个党的关系，是浙大的同学安粤（安毅夫——注）同志，叫我去和他联系；另外，又派了一位黄培正同志来贵阳，他原来是我在清华大学发展入党的同志。这样就由原来的两个党员变成了四个党员，虽然我是支部书记，但是我们没有正式成立一个支委会，有许多事情由我、梁燕、黄培正（因为我们住在一起）共同商量决定。

从香港回来以后，实际上在清华中学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不是一般的教师，是在那里做地下工作，所以出头露面的事情我很困难。当时，我们就决定积极地继续发展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并从中间物色一些好的、够条件的同志吸收到党内来。我记得第一个吸收的就是朱厚泽同志，因为他在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以及其他工作方面都表现了比较高的觉悟，清华中学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实际上就是由他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有几个小组，我已经忘记了，我们那个时候，大多是单线联系；但是，又用读书会等方式，把一些盟员和非盟员组织在一起。

到了贵阳以后，遇到了几件事情比较难处理：

第一件事情就是三、四月份贵阳市内有一些中学和大学发生了反国民党的学生运动，虽然时间不长，因为没有很好组织，后来还是暴露了我们一些进步同学，这是很不利的。那时，我本着南方局的指示，认为对学生运动既不能泼冷水，也不能任其自流发展，不能象在北京时搞“五·二〇”那样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否则会引起国民党的注意，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会使我们的青年同学遭到很大的摧残，因为贵阳是一个反动的基地，象贵大就有带枪的特务学生。所以，后来我们做了一个总结。总结开头肯定了学生运动的成绩，但是提出来今后我们主要任务是要团结同学和认清形势，迎接解放，而不是搞公开的那些斗争。我们还打算把已经有一些基础的清华中学和贵州大学的青年学生和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利用假期组织他们全都回到市里去做市里（贵阳城区）学生的工作，交朋友，团结一批人，发展一些组织，从中发现一些人才，这样在解放以后就可以有一批本地的干部。后来没有再搞学生运动了（指公开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注），我们决定的向市里发展，到市里的一些单位去进行联系，开展交朋友活动，都逐步地开展起来啦！我记得当时联系的有中学的、大学的，还有一些工厂的同志。

第二件事情，就是从安粤那里知道还有一个我们党的组织，是中共贵州地下党的另一支领导，要和我们联系。我根据朱语今同志的交代，任何组织（除非是他派来的人）都不能够有横的联系。根据他的指示，我没有同意和他们联系，只是同意以个人的名义，可以由个别同志和他们进行一些意见的交换。后来安粤同志那里有没有人去和他们联系和交换意见，我就不大清楚了。

第三件事情就是贵大的事情，发生在几月份我已经忘记了，有一个同学被杀害，他不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盟员，据说是特务杀害的。有人曾经提出来要用这件事情来进行一次大罢课，大游行！后来我们不赞成，因为我们不了解底细；同时我们的组织刚刚建立起来，很脆弱，联系的群众也不广，如我们去发动这次运动的话，最后不会有什么很好的结果的，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采取了一个暂时搁下来的态度。

第四件事情，我因为党员比较多啦，加上朱厚泽已经有了五个，我们就作了一些分工：

朱厚泽领导清华中学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因为他们是高三班，所以就积极准备为了毕业以后到市里各个岗位上去作工作，就组织了一些读书会，不断地吸收了一些新盟员。

第二条线就是由梁燕领导的贵大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这条线工作开展得不大，因为贵大有特务学生，工作非常难以开展，有许多同学还比较害怕。虽然工作困难，但在那里仍发展了十几个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盟员。

第三条线就是安粤那里。安粤住在市里，他是当地人（贵州郎岱人——注），他的父亲在当地原来还是很有威信的，他的接触面也很广，同时在浙大也做过学生运动的领导人，所以是有经验的。因此要他负责在社会上开展工作，特别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青年，一个是民主人士。他做了不少工作，是有一些成绩的。当然也有困难，因为他这个人在家里呆着没有职业，很受人注意，很使人注目。

老张（指张立——注）系统，即另一个党组织的联系，也是通过他所认识的人进行的。当时我有点怀疑，是什么道理

老张他们会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系统。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安粤的妹妹叫安鄂，是我们清华中学一位老师的爱人，我很害怕她知道我在清华中学。我到他（指安粤）那里去是改了姓名的，但是有一次上他家里吃饭的时候，突然碰到了他的妹妹，虽然他妹妹没有怎么讲，但我想后来她也知道了我是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的。

第四条线就是新去的黄培正同志。他主要是联系杜蓉，要从杜蓉那里发展一些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盟员。很可惜的就是他在那里不到两个月，和杜蓉的联系也没有几次，虽然每次回来他都谈到杜蓉工作很热情，给她周围的青年同学讲一些形势问题，启发他们能够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至于后来有没有人参加，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杜蓉给我的印象是：虽然她两条腿没有了，躺在床上仍积极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我们对她的印象都很好。

我自己就和这四个同志联系而不直接联系其他的人。

到了五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在积极准备高三班同学毕业班（因七月初就要毕业离校）和其他班级的同学暑假回城时怎样开展工作，如何来分工。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联系的重庆的一个同志，打来一个电报说：“祖母病重已去香港”。就是说他在重庆呆不住了，已经离开重庆到香港去了。这对我是一个震动。

不久，在六月八号晚上，大概八点钟的时候，朱厚泽匆匆忙忙地跑进我的宿舍告诉我，有特务在找我，问我的地址，要我赶快离开。（这是李惠华同志发现情况及时向组织报告的——注）当时，我就和黄培正、梁燕商量了一下，觉

得还是离开的好，因为我们在贵阳无亲无故，没有地方掩护下来。当天晚上就把我们的文件，包括油印机这些东西，由朱厚泽和我藏到大将山上的一个山洞里面。据说解放以后，这些东西还都在，要找我们当时搞的文件，有些资料还是可以找得到的。开始我们还想要梁燕同志留下来，最后考虑到梁燕同志是介绍我来清华中学的，同时他经常到贵州大学去，可能会引起敌人更多的注意，所以决定我们同时走。又因为黄培正同志还没有身份证，没有办法坐汽车，后来我就找了当时清华中学的训导主任王鸿逵先生，向他说明情况，特务在抓我们，我们要走啦，但是黄培正没有身份证，怎么办？因为平时我们知道他是同情我们的。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第二天等训导员到办公室把柜子打开后，他把训导员叫走，由梁燕去拿一张身份证，盖上章就可以走了。我和梁燕就在第二天蒙蒙亮的时候走小路到了市里，把所有的事情和关系交给了安粤同志，并指定由安粤同志负责，告诉他，如果他也呆不住时，交给朱厚泽，他可以到汉口去找朱语今，当时汉口已经解放了。这样，我们就在六月十号坐汽车到柳州，又坐飞机转到香港，自此离开了贵州。以后的情况，我们就不清楚了。到香港以后不久，曾经碰到贵州来的一位同志，说我们离开后的第二天，贵阳全市戒严进行大搜捕，说是有什么共产党的要人找不到啦！我们觉得很可笑。解放以后，我们知道在七月份时，安粤也呆不住了，他也离开了贵阳。

在贵阳这个阶段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分作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到香港去以前，我们主要是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这项工作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妥的，我们所吸

收的一些盟员，现在看来都是好的。

第二阶段就是在我从香港回来以后，我们就积极地在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中间物色对象发展党员；同时准备把我们的工作，扩大到市里面去，并且做上层人士的工作。

总的来说，成绩是有的，但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很多，没有做出更多的工作。我在贵阳呆了十个月，其中有两个月差不多是在香港和汉口，工作时间也比较短。后来朱厚泽他们还继续坚持了活动，这是难能可贵的。大概在贵阳的事情就是这么一些，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不清楚，希望来信告诉我，我再补充。

有一些文件，要问朱厚泽究竟现在还放在哪里？

至于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问题，那是因为得到南方局批准的，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党的青年团。我们的这些同志，听说在解放后曾经受过审查，现在当然都已经平反啰！但我觉得当地贵阳的党组织应该把这个问题再搞清楚。

关于在贵阳的情况，我就简单地讲这么一些，但是由于难以忘却的怀念，我还想说几句话：

我在花溪住了十个月。花溪是很美丽的。那儿弯弯曲曲的溪水，倒映着栽满的翠柳，清彻见底的溪水慢慢地无声地但是不停地流着，一直到桥头的小坝上才发出淙淙的声音。我对这些都是很难忘的，而我更难忘记的是我们在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他们在当时国民党很残酷的迫害下面，进行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杜蓉同志，身体残废，但她勇敢地担起了革命的责任，最后被国民党残酷地杀害了。今年十一月十一日是她殉难卅二周年，我虽然没有过见她，但是，我知道她是一位端庄的、严肃的、对待革命事业又是非常热情的同志。

她在我的心中始终象一朵没有凋谢的红花，直到现在贵阳二中就是过去的贵阳女子中学，把杜蓉同志的革命事迹当作向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料，这是应该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我们当时在一起共同战斗过的同志，现在大多数都在不同的岗位上担负了一定的责任。我希望我们这些同志，不要忘记象杜蓉那样被国民党残杀了的同志，不要忘记在当时那种艰苦的环境中间我们勇于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精神。三十二年过去以后，据安粤同志给我讲，在“四人帮”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一个同志是投靠“四人帮”的，而大多数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现在很多同志都是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我听了非常高兴。我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勉励，不要做那些空头的政治家，不要做官，不要奉承拍马，不要拉帮结派，不要庸庸碌碌地度过自己的一生，更不要忘记自己参加革命时的誓言——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不管我们自己职务有多高，我们始终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论我们的权力有多大，应该想到这是千千万万象杜蓉同志那样的革命烈士流血牺牲而创造出来的新中国，是人民给我们的。我希望我们过去的战友都抱着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牺牲一切的思想，永远不要褪色！永远不要腐化！

（这篇文章是根据姚重华同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在上海华东医院的讲话录音整理，括号里的内容是我附注的——姚礼乾）

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悼念姚重华同志

安毅夫

(一)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奉党组织的命令，从贵阳到达香港。三月初的一天晚上，朱语今同志带了一位年青同志到我的住处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就走了，我仅只留下了一位热情、诚朴的同志的印象。

三月下旬，我回到贵阳。几天后，这位同志到我的家里来，用约定的暗号和我联系，我知道，他就是我在贵阳工作的党的领导人。我们在香港时已经党的组织介绍认识，相见后，彼此都是兴奋的。我向他汇报了我的情况，我在贵阳的关系、我已经进行的工作和今后的打算。之后，他再一次传达了我离开香港时，钱瑛同志和朱语今同志曾向我交代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决定：到贵阳后我们的工作方针是，“麻痹敌人，潜伏发展，调查研究，迎接解放”。我们发展的主要组织是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并从中谨慎地发展党员。随后，我们分析了当时贵阳的形势，研究了我的工作，并决定今后我的工作主要放在社会青年、少数民族和民主人士等方面。

虽然是第一次交谈工作，他却给了我很好的印象。他对